

009922



福州市宗教志

●《福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 编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市宗教志

陸家榮



●《福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 编著

●主 编 姚午生

●副主编 周伟庄 释传常

郑玉桂 徐子晖

●福建人民出版社

第 C27-5

《福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

第一届

主任	姚午生					
常务副主任	周伟庄					
副主任	释传常	郑玉桂	黄钟藩	苏梧	徐子晖	
顾问	黄启权					
委员	苏林田	方行	吴利炳	周意西	陈丹丰	
	严子祺	黄玉官	陈朝辉	周书荣	池惠中	
	李人俊	兰中光	何敦铧	叶翔	陈燊官	
	张爱珍					
主编	姚午生					
副主编	周伟庄	释传常	郑玉桂	徐子晖		
编辑	周书荣	池惠中	何敦铧	兰中光	张一源	

第二届

主任	姚午生					
常务副主任	周伟庄					
副主任	陈小鸽	释传常	郑玉桂	徐子晖		
顾问	卓斌青					
委员	苏林田	方行	吴利炳	周意西	黄玉官	
	陈朝辉	周书荣	池惠中	李人俊	兰中光	
	何敦铧	陈燊官	张爱珍	谢荣增	梁羽	
	释普法	释赵雄	李林洲	赵锦森	姜树香	
主编	姚午生					
副主编	周伟庄	释传常	郑玉桂	徐子晖		
编辑	周书荣	池惠中	何敦铧	兰中光	张一源	

序

《福州市宗教志》历经五年多时间的艰苦编纂工作,在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付梓了。这是我市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宗教地方志书,为人们了解福州、了解福州地区的宗教全貌,敞开了知识的大门。

福州市是我省宗教工作重点地区之一,地处祖国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前沿地带,五大宗教俱全,宗教历史悠久,具有教徒多、教派多、活动场所多、分布范围广、与海外关系密切等特点。但长期以来未能有一部全面展示福州宗教的书籍,诸多宗教历史资料散佚,这与福州宗教的历史地位和宗教工作的形势是很不相称的。因此,认真做好修志工作,不仅是宗教工作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是积累和保存整理一大批珍贵的宗教历史资料的迫切需要,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注重学术品位,对一些敏感的历史积案,既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又注意详略得当,用词相宜,努力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本书的顺利出版,是各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特别是凝聚了编



纂者的大量心血。几位主要的编纂人员克服时间紧、任务重、本职工作忙等困难,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他们为求文稿内容的翔实、准确,查找大量的原始资料,寻访当事人,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到实地现场查看,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反复修改,虽炎夏寒冬,仍笔耕不辍。为赶进度,有的同志甚至带病长时间连续坚持工作。在此,谨向为此书的顺利出版而做出贡献的人们,特别是主要的编纂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意!

《福州市宗教志》的出版,必将充分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重要作用,推进福州市的宗教工作,并进一步推动福州市宗教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为福州历史文化名城走向新世纪做出积极的贡献。

姚午生

1999年7月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道 教	[6]
第一节 传 播	[6]
第二节 道 观	[14]
第三节 主要活动	[20]
第四节 道教文化	[24]
第五节 道 士	[35]
第二章 佛 教	[42]
第一节 传 播	[42]
第二节 组织制度	[51]
第三节 佛 寺	[61]
第四节 主要活动	[82]
第五节 佛教文化	[102]
第六节 兴办事业	[113]

第七节	僧尼居士.....	[117]
第三章	天主教.....	[130]
第一节	传 播.....	[130]
第二节	教会组织.....	[141]
第三节	教 堂.....	[150]
第四节	神职人员和教友.....	[158]
第五节	主要活动.....	[164]
第四章	基督教.....	[174]
第一节	传 播.....	[174]
第二节	教会组织.....	[179]
第三节	教 堂.....	[187]
第四节	教牧人员和教徒.....	[197]
第五节	主要活动.....	[202]
第六节	兴办事业.....	[208]
第五章	伊斯兰教.....	[219]
第一节	传 播.....	[219]
第二节	组织制度.....	[221]
第三节	清真寺.....	[223]
第四节	阿訇和穆斯林.....	[225]

第五节	主要活动.....	[229]
第六节	伊斯兰教文化	[233]
第六章	宗教管理	[237]
第一节	管理机构.....	[237]
第二节	爱国守法.....	[239]
第三节	依法管理.....	[240]
第四节	落实政策.....	[241]
第五节	服务社会.....	[242]
第六节	联络交往.....	[244]
附录一	佛教寺院诗选	[249]
附录二	道教宫观诗选	[302]
后记	[333]

概 述

福州市有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 5 种宗教。

东汉末,三国孙吴时福州就出现道士活动。介琰在福州修炼,侯官人董奉活动在江东一带。西晋太康年间福州建有城隍庙。

三国吴、晋之际佛教传入福州,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侯官(今福州)有药山寺。太康三年(282年)又有灵塔寺与绍因寺,南朝宋至隋(420~618年)建有寺院 51 所。

唐代是道教、佛教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福州地区道教著名的宫观,有侯官的紫极宫、冲虚宫,罗源的洞天宫、天庆观和永泰的乌石宫等。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与大中七年(853年)日僧空海及圆珍曾先后抵榕。闽王王审知对佛教采取扶持政策,佛教建寺 274 所。著名的有福州怡山西禅寺、鼓山涌泉寺、北峰林阳寺、闽侯雪峰崇圣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等。

五代时,高丽、日本僧人曾来雪峰崇圣寺、安国寺向义存、师备参学求法。

宋朝,福州佛教更加兴旺,僧尼达万余人。

宋、元是福州道教最兴盛时期,与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保持密切联系,福州道士有的到龙虎山天师府学道并在那里任职。宋代最早镂版的《万寿政和道藏》出于福州。元代福州建有小型道院和庵堂。

明洪武九年(1376年)清真寺正式对外开放。后清真寺毁于火,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重建。

天启五年(1625年),天主教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传入福州,数年后相国叶向高的长孙带头集资在福州城内宫巷建起福州历史上第一座天主堂——三山堂。崇祯七、八年间(1634~1635年),天主教的耶稣会与多明我会展开争论,前者败后者胜,福州天主教会转入多明我会之手。之后,在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直至道光十七年(1723~1837年),为禁教时期,禁止天主教传播,三山堂被充公改为关帝庙。闽浙总督满宝驱逐外国传教士,勒令奉教者改过自新;福建巡抚周学健斩福建教区主教桑白禄于西门外,福州天主教在半个世纪中陷于奄奄一息之境地。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天主教成立福建代牧区,即由罗马教廷直接管辖的传教区,划归西班牙多明我会。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外国传教士按通商传教,享有治外法权,便又纷纷远涉重洋来福州传教。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解除禁教令。不久,天主教、基督教逐步恢复活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2月)在茶亭建真神堂,为东亚第一堂。咸丰八年(1858年)在仓前山建天安堂。

清光绪七年(1881年),天主教福建代牧区南北分立,北境代牧区设在福州,南境代牧区设在厦门。民国13年(1924年),北境代牧区称福州牧区,民国29年升格为福州总牧区。

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后,美、英等国基督教会,利用五口通商的有利时机,纷纷派传教士来华传教。民国以后基督教在福州地区逐步形成6个教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亦称美以美会,民国36年9月传入);中华基督教会(原名美部会,后改为公理会,民国36年传入);中华圣公会(前称安立甘会,清道光三十年传入);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宣统三年传入);基督徒聚会处(民国

11年传入);真耶稣教会(民国12年由湖南传入)。

明嘉靖以后,由于倭寇的不断骚扰与明末的战乱,寺院的经济成为官府缓年“军储告匱”的主要渠道之一。福州的佛教一蹶不振。

明清以来,道教开始衰微,特别在清乾隆四年(1744年)曾禁止正一真人传度。

清朝,福州佛教向日本与东南亚传播,与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佛教有着渊源关系。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高僧隐元率弟子东渡日本弘法,在日本创黄檗宗。光绪十一年(1885年)福州鼓山涌泉寺住持妙莲到马来西亚弘法,在槟城建极乐寺;西禅寺微妙禅师弟子贤慧等到新加坡,在金桔律创建双林寺。两寺分别作为鼓山涌泉寺、怡山西禅寺廨院。

清末,废科举办学校之风盛行,福州地区也出现占寺宇为校舍、搜寺产办教育的倾向,虽遭到广大教徒的强烈反对,但佛教在福州还是趋于衰微。

民国元年(1912年)4月,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成立,民国3年(1914年)5月中华佛教总会改为中华佛教会。民国17年(1928年)3月成立中华佛教会福建省分会,会址设在于山白塔寺内,由鼓山涌泉寺本忠禅师等主持会务。

到1949年底,福州市(不包括所辖县、市)有外国传教士29人,华籍神职人员258人,教徒33200人,教堂、寺观249座。其中天主教外籍主教神甫11人,华籍神甫11人,传道16人,修生49人,修女103人,教徒21000人,教堂9座;基督教外籍主教、牧师18人,华籍牧师22人,传道28人,教徒1万余人,教堂44座;佛教有僧尼1133人,男、女居士500人,寺庙135座;伊斯兰教穆斯林380人,清真寺1座;道教徒153人,宫观60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福州市宗教界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还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广大信教群众不仅和全市各族人民一道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而且享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同时,人民政府对宗教界人士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团结宗教界的广大爱国人士,支持和帮助宗教界开展国际友好活动。

60年代中后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严重违反宗教政策的粗暴行为,把宗教界爱国人士甚至一般信教群众,都当作“专政对象”,制造许多冤假错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和落实宗教政策,政治上平反冤假错案,经济上给予补偿,清退被占用的教会房产和寺宇,逐步恢复各教派的宗教活动场所。党和政府还对宗教场所进行登记管理,使宗教活动趋向正常化;同时恢复各教派爱国团体组织,协助宗教团体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职业者。至1994年福州有神职人员(含八县、市)728人,教徒35万余人,教堂、寺观698座。其中天主教神职人员20人,教徒12万人,教堂52座;基督教教牧人员708人,教徒23万人,教堂211座(包括点);佛教僧尼2578人,居士1万余人,寺庙314座;伊斯兰教穆斯林800余人,清真寺1座;道教徒300人,宫观120座。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国政治联盟,

加强对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奋斗。

第一章 道 教

第一节 传 播

一、秦汉时期的黄老道

道教是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它是由东汉后期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形成的。道教创立之前,福州在秦汉时就有方仙道和黄老道活动的踪迹,它是道教的前身。这些方士多归隐深山,养性全生,与山结下不解之缘。福州是“东南山国”的一部分,高山深壑、幽谷川流历来是方士垂爱之地。《闽书·方外志·仙道》载:闽清人游三蓬于秦始皇二年(前 245 年)辟谷不饮食。至汉昭帝时,人有见之武夷山中。西汉武帝时有何氏九仙在福州于山修炼,后从福清石竹山到仙游九鲤湖。据《闽书·方域志·福州府闽县》载:九仙“相传本临川人,九人皆瞽,惟长者一目上竖独明。后相率炼丹,以饲湖中鲤,鲤尽化龙,九人各乘一去,今仙游县之九鲤湖是也。九人始入闽时,盖居此山(闽县九仙山,即于山)”。福州于山上有九仙观、炼丹井;福清石竹山有九仙离宫,亦称九仙阁。

东汉时永泰人徐登与赵炳斗道法,以术疗病。《后汉书·方术列传·徐登传》载:“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

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王应山《闽大记》载:“汉徐登修炼于此,后人永福(今永泰)高盖山上升。乡人于此望祀之,遂缘其名。”

二、三国晋南朝时期道教

道教酝酿于汉代,诞生于东汉后期。方士在东汉政治上失意之后,进入民间,潜隐山林,逐渐演变为道士。黄巾起义失败,太平道受到打击,于是张修在汉中创五斗米道。张修死后,张鲁继在汉中推行政教合一,并流行四川等地。张鲁归顺曹操,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后演化为天师道,蔚为道教的正宗,具有特殊的地位。

东汉末、三国孙吴时的福州道士及在福州活动的道士有介琰、董奉。介琰,不知何许人,住建安方山(即五虎山)修炼。他曾从白羊公杜泌学习“玄一无为”之法,能“变化隐形”。他往来东海,过秣陵时,被吴国主孙权挽留礼待,欲学其法,介琰不授其法被射杀,绳犹在而人不见。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董乾村(今属长乐市)人。隐居福山修炼,精通导引之术。善医术,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他往来东海,曾以三丸药给“病死三日”的交州太守杜燮服用,“四日能语,遂复常”。他经常为人治病,不取钱物,治愈者栽杏1~5株,杏熟换谷子以济贫穷,医家“杏林春暖”之颂语,盖源于此。后他“从峰顶上升,履迹存焉,人指其处曰‘董岩’”。长乐市东南十一都有他的炼丹修道遗迹。

晋代有道人任敦。徐焯《榕阴新检》载:晋太康中,道人任敦复入岩中得传金丹秘诀。至唐天宝中升举于此,因名升山。南朝

刘宋时,金陵道士陆修静再传弟子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开创了茅山宗。他为了寻找炼丹的地方,曾改名换姓,潜至福州(王明《论陶弘景》,收入《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南朝萧齐时,王霸跟随其父王增入闽。他善黄老之术,每登怡山(今福州市西郊)经宿乃返;至武夷山居住16年后,又回到福州旧居,常登今福州乌山;跌坐于大石上。他于乌山凿井炼药,并能“占瓦砾为金”。时闽中遇灾,斗米千钱,他鬻金运米救济贫者。后他于所居的“皂荚树下蝉蜕而去”(《乌石山志·仙释》)。

此时道士入闽增多,其修养练功、祈神斋醮的场所宫观也建立起来。福州冶山城隍庙建于晋太康中(280~289年)。《八闽通志·祠庙》载:怀安县城隍庙“在威灵坊内。晋太康迁城,遂建于此……按宋林通《长乐图经》,庙之神乃汉御史周苛也。守荥阳,为项羽所烹。高祖既即位,思苛忠烈,令天下郡县各附城立庙祀之。城隍之祀,疑始于此”。

三、隋唐五代时期道教

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获得发展,趋向繁荣,也是道教全面发展繁荣时期。唐朝廷对道教大力扶植和崇拜,皇族利用老子姓李,攀附同宗,尊崇老子为“圣祖”,封“玄元皇帝”,自称“圣裔”。因此,道教在这一时期获得长足的发展,炼丹术最为兴盛。有的道士寻找炼丹处所来到福州。民国《福建通志·道士传》载,连江人章寿,“开元中得仙术,常斩蛟延平津中”;闽县道士张标“有道术,能通冥府,每三五日辄卧如死,而体僵不冷,既苏多说冥事”;福州人符契元,“上都昊天观道士也。长庆初,德行、法术,为时所重”。《三山志》卷三十二载,福清人刘尊礼,有方术。贞元年间(785~805年)福建观察使李若初,于今福州西禅寺之南王霸旧宅建冲虚

宫，塑任放、董奉、徐登及王霸像为“四仙祠”。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一方的帝王为了发展势力，因袭唐风，崇信并利用道教。由于道士成分及神仙思想的转变，出现钟离权、吕洞宾的仙丹修炼术的金丹道，道教理论进一步发展。闽王王延钧、王昶崇信道教，福州道教鼎盛。金丹道著名道士钟离权来到福州，福州一农家子张生遇见了钟离权（宋方勺《泊宅编》卷九）。道士陈守元、徐彦朴、盛韬参与闽国政权。《十国春秋》载，王延钧于长兴二年（931年）六月作宝皇宫，以道士陈守元为宫主……遂于坛侧建宫，极土木之盛，而巫者徐彦朴、盛韬与守元皆用左道以进。冬十二月陈守元称宝皇之命，语王曰：“王避位受道，当为天子六十年。”长兴三年（932年）夏六月王酷信神仙之术，遣陈守元问宝皇：“六十年天子后将安归？”守元传宝皇语：“六十年后为大罗王。”徐彦等亦附曰：“北庙崇顺王常见宝皇，其言与守元同。”王益自负，始谋称帝，上表于唐……就于龙启元年（933年）春正月，遂诣宝皇宫受册，备仪卫，即皇帝位，国号大闽。王昶继位，于永和元年（935年）十二月赐“洞真先生陈守元”号天师（《十国春秋》卷九十一）。闽王王昶对陈守元“信重之，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九）。结果弄得“一国若狂”，后连重遇反，守元易服欲逃，被乱兵杀死在宫中。

五代闽国时还有邵武人林炫光到福清石竹山修炼，舍宅为灵宝观。福州下渡人陈靖姑（女），闽王王延钧封她为“临水夫人”，赐宫女36人为弟子，建第宅于临水，后加封为“崇福临水夫人”。靖姑逝世后，又加封为“顺天圣母顺懿元君、惠忱慈量天尊”，是妇幼保护神，人称“陆上女神”。